



现代文学的 史学化研究

金宏宇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现代文学的 史学化研究

金宏宇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文学的史学化研究 / 金宏宇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702-0526-4

I. ①现… II. ①金…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4351号

责任编辑: 高田宏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纸工坊视觉

责任印制: 邱莉 杨帆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8.5 插页: 2页

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23千字

定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金宏宇 字本钊，武汉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等。

出版著作《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文本与版本的叠合》《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朴学方法与民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史学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等。已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系列学术论文。已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曾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本书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资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朴学方法与现代文学研究

- 一 何为朴学方法 /3
- 二 学科分支 /6
- 三 现代化转换 /12
- 四 “十分之见” /15

第二章 现代文学的辑佚实践

- 一 古今异同 /21
- 二 发现的技艺 /23
- 三 二重批判 /31
- 四 著述形态 /40

第三章 现代文学辨伪批判

- 一 伪书、伪事 /47
- 二 百年辨伪类型 /54
- 三 律与法 /63
- 四 辨伪即批判 /73

第四章 现代文学版本研究的新路径

- 一 版本本性 /83
- 二 从版本到文本 /89
- 三 文本中的变本 /96
- 四 科际整合研究 /102
- 五 著述形态 /110

第五章 现代文学的汇校本问题

- 一 呼唤汇校本 /119
- 二 研究价值 /122
- 三 技术与理论 /127

第六章 现代长篇小说修改本现象

- 一 修改现象 /137
- 二 释义变异 141
- 三 评述的尴尬 /145

第七章 现代文学的副文本综论

- 一 “副文本”的界定 /153
- 二 打开文本 /156
- 三 多重价值 /162
- 四 负面效用 /167

第八章 文学文本四维论

- 一 从作品到文本再到作品 /175
- 二 文本四维 /178
- 三 新文本观的价值 /182

第九章 现代“杂文学”的在场与缺席

一 趋向纯、杂分立 /191

二 杂文学的域限 /196

三 丰富的潜能 /204

四 破除观念囚笼 /212

第十章 现代作家自传的价值衡估

一 作家自传的兴盛 /221

二 一种非虚构文学 /225

三 作为史料源 /232

四 与传记批评的关联 /236

第十一章 现代作家书信的文史价值

一 作家书信的生产 /243

二 文类三性 /247

三 文学史价值 /253

四 朴学式研究 /260

附：现代作家重要书信集书目 /266

第十二章 现代文学中的影射现象

一 影射作为文学现象 /275

二 影射文本的文史价值 /279

三 影射批评与考索研究 /282

第一章

朴学方法与现代文学研究

朴学是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兴盛的一种新的学术话语、学术范式或学术主潮，得名于其文字、学风的朴实。朴学又叫汉学，是清儒对宋学的不满而对汉学的复兴，是汉学对宋学的学术话语革命。朴学学术话语生成于清代特殊的历史语境，它针对的是宋明理学的义理玄谈，目的是清除佛道对儒学的污染，挣脱理学对儒学的羁绊而重构古典儒学。朴学还有实学、名物典制之学、考据学等不同的称谓。朴学学术话语主要植根于传统经学而推广至史学、金石学、天文学、地理学等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谈论朴学学术话语是离不开其历史语境、特定对象乃至权力关系等的。谈朴学方法却可以悬置这些内容。朴学方法与现代文学研究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将朴学方法剥离出来挪用于现代文学的研究，这正是现代文学研究史学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 何为朴学方法

什么是朴学方法？自命为清代学术蜕分期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和被梁启超认为有清代学术正统派遗风的胡适有过类似的总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说：“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此法此精神，采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证家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① 梁启超认为这是归纳法，所以“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② 梁启超将朴学方法概括为四步，而胡适则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概括为四点：“（1）……每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2）汉学家的‘证据’完全是‘例证’。例证就是举例为证。（3）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举的例不多，便是类推（Analogy）的证法。举的例多了，便是正当的归纳法（Induction）了。类推与归纳，不过是程度的区别，其实他们的性质是根本相同的。（4）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假设’的。……他们所以能举例为证，正因为他们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例之后，脑中先已有了一种假设的通则。然后用这通则所包含的例来证同类的例。他们实际上是用个体的例来证个体的例，精神上实在是把这些个体的例所代表的通则，演绎出来。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与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③ 最后胡适进一步说：“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7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③ 胡适：《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充足,不能使人信仰。”^①胡适认为他们的方法是归纳法与演绎法并用,“求证”之中有“假设”。但是在朴学方法中归纳比演绎更重要,假设也必须落脚于求证。所以,胡适晚年又将朴学方法再概括为“有证据的探讨”(evidential investigation)^②

在今天看来,归纳法、演绎法是一种古老的方法了,但它们是一切科学的元方法。胡适甚至在介绍实验主义时也把它概括为归纳法和演绎法。朴学因为使用了归纳法和演绎法而被梁启超、胡适等认为具有科学精神。如胡适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③朴学方法所体现的科学精神首先是一种实证精神。朴学是一种实证性研究而不是阐释性研究,强调的是客观主义而不是主观臆断,任何见解和立论都必须有事实、事例作证据,即要求“实事求是”。汪中、阮元、钱大昕等朴学家讲治学宗旨和方法时都说过唯“实事求是”而已。梁启超引朴学家凌廷堪的话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校礼堂集》)梁启超说:上引的这段话“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清学派之精神见焉”。^④曹聚仁说:“钱大昕推许戴东原‘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俨然是科学家的头脑了。”^⑤同时,朴学方法的科学精神还表现为一种怀疑与批判精神。朴学强调“无征不信”,没有证据的东西就值得怀疑。朴学正是建构在对理学的怀疑与批判之上的。朴学家正是不满宋儒随意改古书文字、硬改古音为“叶音”、增字改经、望文生义等不严谨的治学方法才致力于实证性研究的。戴东原甚至还强调朴学家要有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精神。他提出不仅要破“人蔽”,还要破“己蔽”。只有破“人蔽”才能空所依傍,

① 胡适:《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

② 《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③ 胡适:《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页。

⑤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67页。

只有破“己蔽”，才能至“十分之见”。要求治学应“传其信、不传其疑”（《东原集·与姚姬传书》）。要言之，朴学方法体现的正是一种科学精神或朴学精神。

不过，这种朴学方法和精神不只是体现在使用了归纳法、演绎法这种元方法方面，还与其他一些学术特点紧密相关。如“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即多为专题性的却巨细毕究的研究。又如朴学追求的是博证，为考证一个问题而搜求证据多达百余则的不乏其例。在文体上，“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而在著述形式上，朴学家喜欢用札记体。他们用札记记下读书心得。“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于预备资料中者。”结果是“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①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这样成书的，结果札记体成为朴学家重要的著述形式。

现代文学研究对朴学方法的借鉴，并不是要我们只去简单地重复那种元方法及相关方法，而首先是要推崇其朴学精神或科学精神。一直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而主要是为义理（主义与理论）所掌控，如革命的义理、阶级的义理、启蒙的义理、现代性的义理，等等。现代文学研究要么成为某种义理的例证，要么从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升华出义理。温儒敏先生的《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一文已作过很具体的批评。现代文学研究中有很大叙述，但其实很多文章的理论资源和学术观点几乎都是雷同的。我们往往先是为人所蔽，然后又为己所蔽。实际上全是代别人立言，重复某种义理。我们缺乏的正是朴学的怀疑与批判勇气和实证的精神。我们的研究也许达到了某种理论深度，但却是空洞化的深度；我们引入许多“吓人而迷人”（钱理群语）的知识谱系，但却可能由越界而导致过度诠释；我们沉湎于思考和思辨的快乐，但却缺少发现和考证的愉悦。我们的研究成果缺乏的是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绵密的实证、肌质感和细节。比如谈新中国文学规范的建构，我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6页。



们一般都会从民族国家的创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体化等大叙述的角度进入。能否找一些更实证性的史料去论述呢？比如新华书店在1948至1949年出现过一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收集了1942年以来解放区文学中的代表作如《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王贵与李香香》等共50多种。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每人都得到一套。如果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新中国文学的理论范本，这套丛书实际上就是指定给新中国作家的创作样本。我们能否从这套丛书的编辑、发行、传播和作家的接受等细节进入去谈这个大问题呢？完全可以，而且肯定会有新发现。所以，现代文学研究如果能发扬朴学精神，多考据，多归纳，不大言自壮，忌言有枝叶，肯定会产生更扎实更厚实的成果。

二 学科分支

朴学方法和朴学精神更具体化在其学科分支之中。胡适认为“朴学”一词包括甚广，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实际上，其中还包括音韵学、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等等。这些分支学科之间可能相互含有，缭绕不清。这些分支学科也各有各的治学方法和范畴。有些已不适合于现代文学研究，有些则可以转换性地挪用。一般来说，朴学的这些分支学科的方法是从对古籍发掘和整理中总结出来的，大体上也是适合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发掘、整理层面。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一书中的分类来说，这个层面是文学研究中的“初步工作”。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研究的“初步工作”是需要挪用这些方法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正是用辑佚学的方法钩沉、发掘作家遗稿、佚文的。如杨霁云和唐弢对鲁迅集外佚文的搜集、陈子善对张爱玲佚文的发掘等。现代文学辑佚与古典文学辑佚的最重要区别是应把重点放在发掘报纸与期刊上，而不仅仅是关注单行本、选本、总集、别集等。文字学、音韵学或训诂学的方法并非现代文学研究的“初步工作”中的主体方法，但有时也用得上。“随着现代文学专

科研的定型化,注释工作加强了……对于朴学在文学、音韵、训诂方面的治学方法和经验,我们在注释工作中是加以继承的。”^①如作家全集的注释、名作普及本的注释,尤其是那些旧学功底很深的作家的作品以及旧体诗词等需要文字、音韵、训诂的知识去注释。一般这种注释只限于弄懂文句的原意。但有时候,对文意的阐释也会有帮助。如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从训诂学的角度看,这其中的“归人”可训为“死人”,这就可加深对剧本意义的理解。不仅是注释,许多文学史故实的考据也离不开训诂。如鲁迅用过一个笔名“宴之敖者”(小说《铸剑》中亦有“宴之敖者”)。这里,“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鲁迅的意思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②表达了对弟媳的不满。这就用上了训诂学的知识。另外,一些现代作家的笔名也需要训诂,如沈雁冰的笔名“逃墨馆主”、“蒲牢”等。至于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它们在朴学中的地位,叶德辉认为是“三者为之根柢”(《书林清话》)。所以其方法更是现代文学研究可以继承和转化的。

校勘学是朴学中的重要分支,它可以涵盖版本学、目录学等。胡适只提校勘学,不提版本学、目录学,盖出此因。校勘又称为校讎。校即榷,敲击之意。勘,校也,覆定之意。讎,李善《文选·魏都赋注》引刘向《别录》云:“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讎也。”指校对时如讎家相对也。引申一下,可以说一本书的不同版本有“讎”(仇)性。校勘或校讎,就是拿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版本校出异同。古籍在传抄、刻印时有错误的,或原书内容阙失、著录遗缺的,或在传播过程中被人妄改的,都需要校勘时校正过来。在校勘实践中产生了传统的校勘学,总结了许多校勘的经验和方法。如王引之的三勇改和三不改,后来陈垣总结的四种校勘法等。这些方法是可以挪用于现代文学作品的校勘的。而现代文学作品的校勘主要出现于两个层面。一是重印旧作并恢复原貌时需要校勘,一是作品不同版本汇校或比较时需要校勘。校勘学的方法在这两个层面上的运用应该是有区别的。

① 朱金顺:《现代文学考据举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277页。

② 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第一个层面的校勘属于现代文学作品的重新整理层面。现代文学作品在发表、出版时出现错误或因手民的误植、编辑的误改等，在作品重印时需要校正过来；因查禁而造成删改的作品，在重印时需要补足缺文；经作者亲属或他人修改过的作品，在重印时需要恢复原貌。这些都属于作品的重新整理层面，都需要校勘。而传统校勘学的方法在这个层面上有很多都得上。许多现代文学作家出文集、全集或一些名著的重版等都会使用传统的校勘方法，如鲁迅编《且介亭杂文》就做了细致校勘。经过细致校勘，这些文学作品才可能有恢复历史原貌的精校本。但是，因为缺乏校勘学的基本常识，使现代文学作品至今仍未恢复历史原貌的情况依然存在。如收入《曹禺文集》和《曹禺全集》中的《雷雨》，据编者说是依据初版本校勘的。但正是由于编者的校勘，反而出现了一些与初版本不同的文字，如人物表中鲁大海的身份由“煤矿工头”改为“煤矿工人”。这种改动原是曹禺自己在《雷雨》收入开明书店的《曹禺选集》时改的。也许编者校勘时又依据了开明选集本或以后的版本。这就更导致了校勘的混乱。又如《骆驼祥子》收入《老舍文集》时是由老舍长女舒济校勘的。据说也是依据初版本校勘的，但实际又参考了《骆驼祥子》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结果文集本《骆驼祥子》漏掉了初版本的四处文字，其中有一处就是关于“白面口袋”的描述。所以其文集所收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骆驼祥子》的初版本。《茅盾全集》所收《子夜》本是《子夜》1954年的修订本，即茅盾弄出的定本，但全集编辑者却将一些词汇改回到初版本，如“女护士”改成“看护妇”等，使《茅盾全集》所收《子夜》既非其初版本又非其定本。所以，由于校勘不当或标准不统一，使得全集、文集这种本应是更可靠的整理成果反而不可信。在整理层面的校勘成果中，《中国新文学大系》应该是校勘做得较好的。

第二个层面的校勘是关于作品异文的汇校或不同版本的比较。许多现代文学作品出现的异文或异本主要是作者自己修改导致的，我们要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也需要校勘，不过这时只需要用对校法或死校法，即只需要

将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两两互校。不是定是非，而是校异同；不是勘误，而是存异。已出版的《女神》汇校本、《围城》汇校本等都使用这种校勘法。现代文学作品异本的研究和比较一般只需用这种校勘法。

从治学的程序来看，应该是先查目录。因为，目录学是指点门径之学。“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①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亦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学的内容何指，有不同的界定。目录学家汪国垣在《目录学研究》中综集古今目录学的界定，认为目录学家、史家、藏书家、读书家各有各的目录学，其侧重点不一样。但目录学的要旨正如章学诚所说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讎通义·叙》）。正因为目录学著作有这样的功能和价值，它也就成为后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凭借。后人凭借前人的目录著录能了解图书的分类、学术的源流，从而考辨著述的真伪、分合和阙佚。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为简明目录，只对书名、著者、册数等进行简要著录。一为提要目录，对所著录各项都有扼要的叙录，能钩玄提要、交代因由并评价优胜短长。这种目录更能体现学术功底，也更有用于学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也吸收了传统目录学的方法，编制了大量有益于现代文学研究的目录。如阿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中的《创作编目》、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及其他学者编制的大量作家的著译系年目录、作家研究资料目录、文学报刊目录等，都能为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料查找指点门径。只是这些成果多半是简要目录，而缺少提要目录，即有“目”无“录”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也许是人们对“目录”这个概念的理解日益窄化的缘故）。另外，罗列式的目录多，精于考证和辨析的目录少。这使得现代文学的目录学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如现代文学作品有大量因修改而产生的异本，如能借鉴传统目录学方法编出一部关于现代文学作品版（文）本谱系的目录，即在

^①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